

“六个精准”是精准扶贫的本质要求

——习近平精准扶贫系列论述探析*

汪三贵 刘 未

[摘要]2013—2015年间,习近平在湘西、云南、贵州等地考察时提出了精准扶贫的概念,并明确提出了“六个精准”的要求,继而将精准扶贫作为中国扶贫的基本方略,这不仅成为指导中国农村扶贫的基本方针,而且成为扶贫实践的主要抓手。

[关键词]习近平;精准扶贫;“六个精准”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273(2016)01-0040-04

2013年11月,习近平在湘西考察时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的概念,他要求“扶贫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要精准扶贫,切忌喊口号,也不要定好高骛远的目标”。^[1]2015年1月,习近平在云南考察时再一次指出“要以更加明确的目标、更加有力的举措、更加有效的行动,深入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项目安排和资金使用都要提高精准度,扶到点上、根上,让贫困群众真正得到实惠”。^[2]2015年6月,习近平在贵州考察期间明确提出了六个精准的要求,即“扶持对象要精准、项目安排要精准、资金使用要精准、措施到位要精准、因村派人要精准、脱贫成效要精准”。^[3]在2015年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的主旨演讲中,习近平将精准扶贫作为中国扶贫的基本方略。^[4]精准扶贫不仅成为指导中国农村扶贫的基本方针,而且成为扶贫实践的主要抓手。

一、中国农村扶贫要实施精准扶贫

长期以来,中国农村扶贫的主要特点是区域瞄准,即选择一定的贫困区域进行重点扶持。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扶贫的主要对象是国家或省确定的贫困县。1988年,中央确定的国定贫困县为328个,各个省和自治区确定的省定贫困县为370个。1994年,国家制定《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时将国定贫困县的

规模扩大到592个。2001年,中国颁布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在保留592个扶贫开发重点县的同时,开始将扶持的重点转向15万个贫困村。2011年,新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颁布,在保留592个扶贫工作重点县和12.8万个贫困村的基础上,国家又确定了14个连片特困地区。^[5]可见,中国的农村扶贫长期以贫困地区的区域开发为主要手段,通过区域发展带动贫困人口脱贫。

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和对贫困地区的持续开发带来了大规模的减贫,按世界银行1天1美元的贫困标准估计,中国30年间减少了近7亿贫困人口。^[6]1981—2008年,全球的贫困人口从15亿减少到8.05亿,中国贡献了这一时期全球减贫的90%。^[7]2000年,联合国首脑会议提出了千年发展目标,要求到2015年使生活在1天1美元以下贫困人口的比例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半。中国是世界上首个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减贫目标的国家。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的比例从1990年的60%以上下降到2002年的30%以下,率先实现比例减半,2014年则下降到了4.2%。中国在这一时期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8]

然而,大规模的扶贫开发有力地促进了贫困地区的经济增长并带动了贫困人口的脱贫,但同时也使贫困地区内部的收入分配差距不断

*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015应急项目“我国贫困地区精准扶贫政策研究”[7154103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汪三贵,中国人民大学反贫困问题研究中心教授;刘未,中国人民大学反贫困问题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①参见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编:《中国农村扶贫开发概要》,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

②参见[美]安格斯·迪顿:《逃离不平等:健康、财富及不平等的起源》,崔传刚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

扩大。在《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实施期间,扶贫工作重点县不同收入组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最低收入组的收入与最高收入组的收入之比从2002年的21.59%下降到2010年的17.38%,而且收入水平越高的收入组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增长很快。与此同时,贫困地区的经济增长明显有利于高收入农户,从而导致收入差距扩大。2002—2009年,贫困户、重点县农户和全国农户的收入增长速度分别为2.75%、11.76%和11.04%,贫困户的收入增长速度比贫困县农民的平均增长速度低9个百分点。贫困户收入占全国农村居民收入的比例持续下降,从2002年的1/3下降到2009年的1/5。^[7]

在贫困地区内部收入差距扩大的背景下,依靠经济增长来进一步推动贫困人口下降的难度越来越大。因此,实施更加有针对性的扶贫政策来直接对贫困人口进行扶持就显得越来越重要。精准扶贫就是为了增加扶贫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抵消经济增长减贫效应的下降而必须采取的措施。

二、精准扶贫就是要扶贫到户到人

精准扶贫最基本的定义是通过贫困家庭和人口有针对性的帮扶,消除导致贫困的各种因素和障碍,增加自主发展的能力,达到可持续脱贫的目标。简单地说,精准扶贫就是要扶贫到户到人,而不能停留在仅仅扶持贫困地区、促进区域发展的层面上。精准扶贫主要包括:通过一定的方式对贫困户进行精准识别,在找出致贫原因的基础上进行精准帮扶,根据扶贫对象的实际状况进行有进有出的动态管理,对贫困户的扶持效果进行考核,以保证精准脱贫。精准识别就是通过一定的方式将低于贫困线和多维贫困的家庭和人口识别出来,同时找准导致这些贫困家庭或人口贫困的关键性因素,它是精准扶贫的基础。精准帮扶是在精准识别的基础上,针对贫困家庭的致贫原因,因户因人施策,消除致贫的关键因素,在保证基本生活水平的基础上提升自我发展能力,实现可持续脱贫。动态管理是对所有贫困户和人口登记造册、建档立卡,及时更新贫困家庭的基本状况、致贫原因和帮扶措施等方面的详细信息。每年根据贫困状况的变化,动态调整贫困家庭和人口,保证应扶尽扶。精准考核首先是对贫困户的扶持效果进行考核和评估,保证精准脱贫,其次是对地方政府的扶贫绩效进行考核,督促贫困地区政府将工作重点放在扶贫和改善民生方面。

三、坚持“六个精准”,打赢脱贫攻坚战

为了落实精准扶贫方略,习近平提出“六个精准”要求,即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六个精准”是精准扶贫的本质要求,是做好精准扶贫工作的关键所在。

(一)扶持对象精准

要使精准扶贫有效,就必须准确地找到要扶持的贫困家庭和人口。目前,全国识别贫困人口的方法是在总指标控制下,由基层通过民主评议和建档立卡来识别贫困人口。

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的数量是由国家统计局根据约7万农村住户的抽样调查数据推算出来的。2014年底,人均消费支出或人均纯收入低于2800元贫困线的贫困人口在样本户中的比例为7.2%。将这一比例乘以全国农村人口总数就估计出农村贫困人口7017万。^[8]为了控制扶贫人口的规模,防止地方为了获得更多扶贫资源而过分夸大贫困状况,国家将统计部门估计的贫困人口数分解到地方,同时允许上浮10%,地方政府在指标的控制下进行贫困人口识别。由于缺乏所有农户可靠的消费支出和收入数据,地方政府无法根据收入和消费支出识别贫困人口,而主要采取民主评议的方式进行识别和建档立卡。基层在民主评议中通常使用综合标准,既考虑农户的收入水平和消费状况,也考虑家庭成员的健康、教育、能力、家庭负担、财产状况,也会受人际关系的影响,基层识别的贫困是一种多维贫困而不仅仅是收入和消费的贫困。统计部门和基层扶贫部门在估计和识别贫困人口时采用的指标和方法的不一致必然导致精准识别出现问题。根据我们的典型调查和国务院扶贫办的随机抽查,按民主评议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和按消费及收入估计的贫困人口的重合度约为50%。这意味着有相当一部分收入和消费支出低于贫困线的人没有建档立卡因而得不到有效扶持。

在今后对扶持对象的进一步识别和动态调整过程中,需要在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改进识别。首先,考虑到贫困的多维性,以及收入和消费收据的缺失,国家对贫困人口数据的估计应该转向多维贫困,利用多维贫困的测量方法来估计总贫困人口。其次,要识别更多贫困线以下的收入和消费贫困户,有必要扩大建档立卡的规模,增大覆盖面。建议按国家统计局估计贫困人口数量的1.5—2倍进行建档立卡,减少贫困

线以下农户得不到扶持的可能性。再次,在基层民主评议中需要更加重视收入和消费因素,同时用严格的否决性指标排除掉不合格的人群,大幅度降低人为操控的可能性,杜绝建档立卡过程中存在的一些明显造假行为。

(二)项目安排精准

扶持对象识别出来并建档立卡以后,就需要根据贫困户和贫困人口的实际需要进行有针对性的项目帮扶,做到因户因人施策。这就需要找准每个贫困家庭的致贫原因,并分析哪些因素是可以通过扶持在短期内得到解决或缓解的,哪些因素需要长期干预。根据全国建档立卡数据分析,疾病、缺资金、缺技术、缺劳力是贫困户主要的致贫原因。42.1%的贫困农户因病致贫,35.5%的贫困农户因缺资金致贫,22.4%的贫困农户因缺技术致贫,16.8%的贫困农户因缺劳力致贫。致贫因素在区域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东部地区贫困人口致贫原因主要为人力资本因素,因病因残致贫、缺劳力致贫的比例在东部地区最高,58.1%的农户存在因病致贫的现象,远高于西部地区(28.9%)。这与东部贫困人口中老年人、没有劳动力的人和文化程度低的人口比例高是一致的。西部地区致贫因素更加复杂和多样化,既有地理、生态和自然资源的因素,也有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还有家庭人力资本不足的限制。西部44.9%的农户存在缺资金致贫的现象,缺技术、缺土地、缺水、因灾、因学、交通条件落后等因素致贫的比例在西部地区都是最高的。中部地区因病致贫和缺资金致贫的问题最为突出,分别为51.6%和28.9%。东、中、西部地区的贫困村在饮水、通电等基本生产生活条件方面差距也比较大。西部和中部地区分别有27.8%和23%的农户没有实现安全饮水,22.9%和13.1%的农户饮水困难;西部地区仍然有2.6%的贫困村没有通生活用电,10.3%的贫困村没有通生产用电,有6.5%的农户未通生活用电,16.3%的农户居于危房。^[9]这些指标都远远落后于中部和东部地区。更为重要的是,多数贫困户的致贫原因不止一个,是多个致贫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在找准每一个贫困户致贫因素的基础上,需要有针对性地安排扶持项目,对家庭和个人进行有效的帮扶。由于致贫原因的综合性 and 差异性,扶贫项目也必须是综合性的,需要短期和长期扶持项目相结合,项目在贫困户之间也会有明显的差异。例如,对有劳动能力的贫困家庭,重点通过培训来提高能力,同时扶持家庭的

产业发展和就业来增加收入。对于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家庭,则需要通过资产收益扶贫和社会保障来保证其基本生活,并通过合作医疗和大病保险(救助)来维持其基本的健康状况。对于生产和生活环境恶劣,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的地区,则重点通过移民搬迁来解决基本生存条件的问题,并对搬迁后的生产和就业进行重点扶持。对于所有贫困家庭,都需要帮助解决儿童的营养、健康和教育问题,以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三)资金使用精准

要保证扶持项目得到实施就必须有相应的资金支持。以往的各类扶贫资金(包括专项扶贫资金和部门扶贫资金)的管理方式缺乏足够的灵活性,地方政府缺乏资金使用的自主权,难以做到精准扶贫。为了保证资金安全和便于审计,往往对资金的用途、使用的方式、扶持的标准规定过死,导致一些贫困户需要的项目没有资金来源,不需要的项目却安排了资金,大大降低了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

精准扶贫面对的是2000多万户贫困家庭、7000多万贫困人口。致贫原因千差万别,对扶持项目和扶持方式的需求大不相同。要保证精准扶贫有效和可持续性,必须根据贫困户的实际情况因户因人制宜安排项目和资金,使资金精准使用。这就要求将资金的分配和使用权下放给对贫困户的情况最了解的基层政府,让其根据实际情况确定项目和分配资金。由于致贫因素的综合性 and 复杂性,贫困农户通常需要多方面的扶持。例如,除了创收项目外,还需要培训和教育扶贫、医疗扶贫、社会保障等。这就需要对各个行业部门的资金进行捆绑和整合,以便于综合扶持。

(四)措施到户精准

要保证精准扶贫的效果仅仅确定扶持项目和提供扶持资金还是不够的。以往的扶贫经验表明,很多扶贫项目不仅难以到户,到户后效果也很差,主要原因是贫困户在发展生产中面临诸多的障碍,他们缺技术、缺资金、缺市场信息、缺市场经济的理念和行为方式。让贫困户单独户地与公司、合作社和大户等现代农村经营主体竞争,成功的希望非常渺茫。

地方政府需要重点探索和建立贫困户的受益机制,重点是保证扶贫效率到贫困户,而不是片面强调所有的扶持项目和资金都要到贫困户。在产业发展和创收方面,重点探索如何将贫困户纳入现代产业链中,解决贫困农户经常面临的信

息、技术、资金、市场等方面的困难。如采用公司+合作社+贫困户的产业组织模式,专业化的公司和合作社可以帮助贫困农户解决信息、生产技术、产品销售甚至资金方面的问题,贫困户只需要在公司和合作社的指导下提高产量和保证产品的品质,大大降低了贫困户发展产业的门槛。针对一部分失去劳动能力和劳动能力较弱的贫困家庭,实施资产收益扶贫项目。将贫困地区的自然资源、公共资产(资金)或农户的土地和林地等资本化或股权化,交给公司、合作社和大户等经营主体进行经营,贫困农户按照股份或特定比例获得分红收益。资产收益扶贫不以劳动能力、特别是独立的生产经营能力为实施条件,项目的经营主体是公司、合作社和大户,失能和弱能贫困户即使不参与项目的经营管理也能直接和间接受益。因此,资产收益扶贫是扶持失能和弱能贫困人口的有效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现有扶贫措施的不足,能显著提高扶贫到户的效率和效果。在移民搬迁项目中,需要采用差异化的补贴政策,增加对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建房补贴,同时通过控制建房标准来降低搬迁成本。在迁入地则需要提供基本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并优先选择有土安置方式。对于与城镇化结合的无土安置,则需要提供充足的就业岗位,防止搬迁人口因没有收入来源而陷入新的贫困境地。在西部地区,以中心村建设为重点的就近搬迁可能是更现实的搬迁模式。移民搬迁最终需要达到贫困户能搬得起、稳得住。在金融扶贫中则需要通过信贷、保险和抵押市场的综合金融改革增加贫困户获得金融服务的能力。

(五)因村派人精准

精准扶贫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的成功实施需要强有力的组织保障。大量的扶持项目和措施都需要由村一级来具体实施,村级组织的能力是影响精准扶贫效果的关键因素之一。由于贫困村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大量年轻人外出就业,导致贫困村干部普遍年龄大、文化程度低、能力较弱。贫困村的村级治理能力长期处于不断弱化的状态,这也是导致贫困状况严重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种状况在短期内难以显著改善,从而给精准扶贫工作的落实带来挑战。

上级政府通过向贫困村选派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可以在短期内大幅度提高贫困村的管理水平,有利于精准扶贫工作的实施。驻村帮扶制度的确立可以在多个方面促进精准扶贫工作。一是帮助村两委改进贫困户的识别方法,协助解决和协调识别过程中容易出现的矛盾;二是利用帮扶

单位和个人的力量,从外部组织和动员更多的资源用于精准扶贫;三是协助村两委建立有效的扶贫到户机制,让贫困户真正受益;四是对村级的精准扶贫工作进行有效的监督,防止人情关系、弄虚作假和腐败行为的发生;五是在精准扶贫过程中培育贫困村村干部的责任心和能力,增强贫困村的内生发展动力,让其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

(六)脱贫成效精准

精准扶贫的目的就是要使现有标准下的贫困人口到2020年全部脱贫,并且要保证扶贫成果真实可靠,具有可持续性。要达到脱贫成效精准,前面的五个精准是保障。在此基础上,还需要对脱贫效果进行科学的考核和评估,防止成果造假和贫困人口被脱贫现象的发生。

国家统计局可以利用农户抽样调查数据每年对全国和各省总的减贫状况进行可靠的评估,从而为国家根据减贫效果调整扶贫政策提供决策依据,并制定相应的奖惩措施。由于样本量的限制,国家统计局无法利用抽样数据评估省以下地方政府的减贫成效。8000多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脱贫状况则需要通过独立的抽查方式来进行核查和评估。这就需要进一步制定明确和量化的脱贫标准,并组织动员社会力量参与贫困的动态监测、分析和评价。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赴湘西调研扶贫攻坚[EB/OL].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1/03/c_117984236.htm.
- [2]习近平在云南考察工作时强调:坚决打好扶贫开发攻坚战[EB/OL]. http://www.gov.cn/xinwen/2015-01/12/content_2807769.htm.
- [3]李婧.习近平提“精准扶贫”的内涵和意义是什么[EB/OL]. http://www.ce.cn/xwzx/gnsz/szyw/201508/04/t20150804_6121868.shtml.
- [4]习近平主席在2015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的主旨演讲[EB/OL].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0/16/c_1116851045.htm.
- [5]The World Bank. An update to the World Bank's estimates of consumption poverty in the developing world[R]. World Bank 2012.
- [6]国新办介绍扶贫工作最新进展[EB/OL]. <http://www.xinhuanet.com/live/20151012z/index.htm>.
- [7]张伟宾,汪三贵.扶贫政策、收入分配与中国农村减贫[J]. 农业经济问题, 2013, (2).
- [8]国家统计局. 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502/t20150226_685799.html.
- [9]中国人民大学反贫困问题研究中心. 全国扶贫开发建档立卡数据分析报告[R]. 2015.

责任编辑:涵林

“Six Accuracy” as the Essential Requirements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On General Secretary Xi’s Interpretations on Accurate Alleviation: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put forward the concept of accurate poverty alleviation on his inspection tours in the western Hunan, Yunnan and Guizhou during 2013–2015, and later specified requirements for “Six Accuracy”. The concept subsequently come off as a fundamental strategy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in China, not only serving as a significant policy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in rural China, but also as a starting point in practices. (Wang San-gui and Liu Wei)

On Governmental Purchase of Agricultural Welfare Services: Explorative Practice and Rational Thoughts: We have stepped into the crucial stage of accelerating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upgrading and following a modern pathway for agri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 With the overall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a faster speed, a series of problems surge: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robust rural young labors flowing outwards, less competent agricultural labors, the inadaptabilit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and incomplete socialized service system for agriculture, etc., all of which barely accommodate requirements for industrialization, urbanization, informationization, and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It is necessary and urgent to further innovate the development mechanism for rural areas, boost the modal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s well as construct a new socialized service system for agriculture. (Guan Rui-jie and Zhou Na)

On State Ruling and Governance: An Emerging Circumstance and Its Response: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the national conditions at Chinese initial socialist stage has dramatically changed, while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has been reshaped. And the strategic layout of “Four Comprehensives” calls for new missions in a new era. All indicate that the Party’s Ruling and Governance has entered into a new historical circumstance.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with Xi Jinping as its Secretary General, clarified a series of new governance concepts of achieving a state governance system and modernizing governance capability, and put forward new measures to consolidate the CPC’s leadership, pool massive consensus, implement an all-rounded plan for the whole, and promot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All represent new response to the current circumstance for state ruling and governance. (Cao Yong-xin)

The Comprehensive Transformation and Power Transfer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ongoing comprehensive transformation and power transfer is a sophisticated revolution concerning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China, manifested in various aspects such as social mentality, behavioral mode and interest structure. The realistic logic of the transformation began with the structural one. The transformation inevitably bring about power transfer which involves changes from volume-driven investment to innovation-driven investment by initializing innovation to lead China’s development, from the orientation of material resources to that of human resources by activating inner momentum to boost China’s development, from demand side to supply side by bringing supply dividends to rejuvenate China’s development, and from the elite guidance to massive creation and innovation by encouraging popular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to buttress China’s development. To study the current issu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we shall figure out the accurate historical coordinate, command the realistic logic, and grasp the fundamental trend of its development. (Han Qing-xiang and Zhang Yan-tao)

New Features and Trends in the Changes of Current National Security Situation: Given that security serves as a premise and basis for development, national security comes as a prerequisite for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Chinese nation. The world has been going through unprecedentedly dramatic changes in various situations, namely the contrast of international power, the systematic structure of global governance, Asia-Pacific geopolitical situation, and the competition in international economy, technology and military strength. In China’s significant transformation from a big nation to a powerful one, domestic and outside challenges alternatively pop up, and national security issues tend to be complicated and risk-increasing with the intertwined emergence of traditional and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concerns. Confronted with new features and trends of national security, we shall uphold the guidance of the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concept, and effectively drum up our security-maintaining competence through army strengthening. (Yan Xu)

On the Cultural Concerns in Contemporary China and Their Countermeasures: The current society witnesses obvious survival anxiety, acerbated conflicts between social values, unbalanced social mentality, reified cultural pursuit and weakened ideals, and etc. The genesis and sustaining of current spiritual problems result from Chinese transitional stage at which individual independence relies on material resources, the overlapping effect of accelerated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society and relatively underdeveloped spiritual life, the utility-driven and vulgar cultural industry, and the penetration of western capitalists’ values. We shall set up an ultimate goal of bringing forward the complete liberation and development to educate people how to balance material and mental life, carry forward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s, and intensify dominant ideology construction. We shall also focus on working out realistic problems, and optimize psychological persuasion for cultivating rational and peaceful mind so as to deal with problems in spiritual life. (Pan Li and Dong Mei-hao)

On Inner-Party Supervision and Political Ecosystem: It is imperative to purify political ecosystem and set up a desirable environment for a clean government in the course of socialist polit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Optimizing political ecosystem refers to streamlining an overall clean and positive environment for politics through the inner-party life of “integrity and frugality”. It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and realistic significance to discuss the relations between inner-Party supervision and political ecosystem, which is not only conducive to a deeper recognition of the supervision, but also to increased feasibility of political ecosystem optimization. (Chu Er-kang and Zhao Yu-xia)

On Chinese Pathway and Chinese Mode: The 17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put forward the pathway to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18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defined the pathway issue as the one concerning the fate of state, ethnicity, Party and peoples and as the means to accomplish the socialism undertaking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Deng Xiaoping many a time mentioned Chinese model and clarified its primary features.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speeches about Chinese model clearly indicate the unity of Chinese pathway and Chinese model. The former lays weight on a diachronic description of Chinese development course while the latter focuses on a synchronic depiction, comprising two sides of the same issue. (Xu Chong-wen)

On Western Democratic Institution and Chinese Democracy-Developing Pathway: Like a mirror, the continually fermenting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uncovers thoroughly the deep-rooted defects and tremendously detriment influence of western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which deprive universality myths of ideological basis.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reflecting upon and reforming western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promptly became an unavoidable theme. It is of paramount significance for us to deeply analyze the essence of Western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through global media’s reflection on them in a bid to hold our confidence in domestic institutions and further promote the socialist democr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Liu Zhi-ming)

(翻译:张剑锋)